

张载哲学与中国古代 思维方式研究

李晓春 著

中 华 书 局

**“兰州大学敦煌学与人文科学系列研究”
哲学丛书学术编辑委员会**

主 编：陈春文

编 委：李晓春 石福祁

兰州大学“985 工程”敦煌学与人文科学基础研究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相互关系中蕴含的思维结构研究”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太虚与糟粕——试论张载气论在北宋理气关系发展中的奠基地位”、“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资助

缘 起

陈春文 郑炳林

多深的地下水决定了植物能扎下多深的根,决定了什么样的植物能在此地存活下来,由此观,广阔的大西北的植物们存活得不易;降水量与蒸发量的悬殊比例决定多少万年的生物链积累让大西北存活了那薄薄几公分的草皮,而多少脆弱的草皮能养活多少脆弱的羊群和牛群也是有定数的,多少羊群和牛群能养活多少人也是有一定比例的,由此观,大西北只适合游牧群落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汉族的农耕文化得不到这一片广袤的大自然在法则上的垂青。

农耕且不能负载,工业化大生产的刺激、挑战与破坏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加不言而喻了。现代大学当然是工业分工和工业化大生产的衍生物,大西北真的能负载一所以基础学科为支撑的高水平大学吗?我们虽然在大西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内心的此一疑惑却始终挥之不去。兰州大学就是建立在这种种疑虑之上的大学,作为大学理念基本支撑的文史哲三系科就是在这种种疑虑中徘徊挣扎的学科,学科生存和成长的艰辛,师生的艰苦卓绝,没有经历过尤其没有长时间经历过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有点阳光就灿烂,这是文史哲这种人文学科的固有特点,没有阳光仍然灿烂的日子我们也长时间地经历过,但这是靠贫病交加的过度

消耗硬挺过来的,有学术信仰的人可以做出这种过度的牺牲,但不能被社会力量视为理所当然。现在,985 的阳光终于也在兰州大学文史哲的身上撒落一些碎影,哲学人当然会以崇高的责任感,以三千年哲学认知和五千年文化感知的肃穆催发自己的学术热情,为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和兰州大学艰难中保持的尊严和高贵,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我们在敦煌学 985 平台下贡献的“哲学系列”丛书,表达的正是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专业师生虔诚的学术责任感和内心坚定的尊严。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和实施单位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前身为兰州大学哲学系,于 1978 年正式建立,并招收第一届哲学专业本科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其间有韩学本、刘文英、高尔泰等一批名师在此任教,2004 年 7 月组建哲学社会学院。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院师生恪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追求,发扬“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团结协作”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厚积薄发,淡泊名利,认认真真教书,扎扎实实治学”的学术风气。“穷天地,纳百川,独守青山绣景色;求真知,筑正义,共举德赛扶中华”是对学院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学院不断凝练学科与学术发展方向,在现象学哲学、西部社会学、网络社会学、西北宗教文化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学院所办《科学·经济·社会》杂志是融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类跨学科学术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1992 年至今连续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重要期刊检索系统”(CSSCI)来源期刊。

项目负责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创建于 1979 年,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建设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也是兰州大学 985 工程、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历史文献学和敦煌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财政部、教育部、兰州大学先后投入经费 2300 多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

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 130 多项,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敦煌吐蕃文献”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 部。

双方将以 985 平台为契机,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加强学术交流,寻找结合点,促进敦煌学与哲学学科建设的共同发展,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也为再度辉煌中的兰州大学贡献心力。

谨以此为哲学系列丛书之“缘起”。

2011 年 6 月 6 日于兰州

自序

开始思考张载的哲学,大约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思考的结果,写到了我第一部著作的相关章节之中。虽然如此,对张载哲学的思考似乎并不能结束,因为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对于张载的哲学命题“太虚即气”有一个很大的争论;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张载哲学的研究就远没有结束。我们在此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在张载哲学中会出现这样的争议,这个争议是不是仅仅是个别的学理的问题,还是有着更加深广的思想含义。带着这个问题,翻阅古代哲人们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古人并没有就“太虚即气”命题中的“即”字发生争议,他们会争论太虚的含义是理还是气,但他们不会争论“即”字的含义是什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人那里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现代人遗失了古代思想的一部分精义,然而这种遗忘是怎样发生的呢?

西方哲学上个世纪出现的解释学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我们很难真正地把握一个文本的原意,文本的意义总是由于阅读者不同的处境而有一个解释学意义上的改变。这个主张是真实的,它增强了我们对于人类思想延展的理解,但是在中国哲学中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对古代精神的遗忘,而不是解释,

解释不能成为遗忘的借口。在唐末,哲人们感慨儒家道统的断绝,从而有宋明新儒家的绍续与复兴;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原意被当代思想所遗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遗忘的原因是明确的,当中国在1840年代被西方的炮舰轰开大门之后,西方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中国,在近两百年的文化交流和冲突之中,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日益西化,以至于中国的哲学史也要以西方哲学的方式来进行编排。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中国人的思想逐渐开始偏离传统的思想,并开始遗忘我们传统思想的精义。其实,中国也有一个自己的解释学系统,这与西方的解释学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思想中,新的哲学流派既继承前代的哲学思想,又扬弃前代的哲学思想,西方思想是寻求真理的学问,如果一个哲学家不能创造出不同于前人的哲学思想,那他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哲学家。这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解释系统中,解释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思想的原意必须在新的思想系统中寻求到它的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时候会距离原意有一个相当的距离。但是中国思想不是求真理的学问,它是寻求道的学问,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认为道是会经常地变来变去的,或者会因为不同的人的解释而有一个不同的景观。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解释学更加强调对于原意的恢复和显现,所以,成为中国的思想家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认同道,比如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是不是能够最终顿悟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

这样说起来,研究张载的哲学,就不是一个局部的研究,而是一个关涉到全局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在本书的第一、第二章,并没有直接地讨论张载的哲学,而是讨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本体论;这是因为中国思想正是从思维方式和本体论上与西方思想明确地区分开来的。这也就是说,理解张载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张载哲学本身的理解,而在于对中国整个的思想形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也只有在这种宏观的视域里,一些被我们现代思想界所遗忘的东西才有可能重新显现出来。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来写作的,我们是以张载哲学作为一个契机,作为一个机会,从而使真正的中国思想的原貌向我们展现出来;同样,只有真正领悟了中国思想的精髓,我们才能

切实地吸收西方思想的有益成分,从而使中国本土的哲学走进现代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经过近三年的写作,本书终于于2011年9月最终完成,又经过10、11两月的校对,交付出版社出版。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中华书局的张继海先生和高天女士对本书出版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本书最终能如期完成并出版。同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要衷心感谢几个课题对于本书写作和出版的资助,它们是: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与人文科学基础研究、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太虚与糟粕——试论张载气论在北宋理气关系发展中的奠基地位”、“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

2011年11月于兰州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象思维与体用论、理一分殊的发展历程	1
第一节 先秦中国文化中包含的法象思维方式	1
第二节 汉代中国思想的法象思维方式	10
第三节 魏晋时期中国思想的思维方式	18
第四节 佛教时期“体用论”与“理一分殊”的形成	36
第五节 体用论和理一分殊在宋明理学中的成熟	45
第二章 中国本体论述真	77
第一节 老子关于“无”的思想	77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本体论思想	83
第三节 佛教时期的本体论	93
第四节 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形成	107
第三章 中国古代政治、宋明理学的创立和张载哲学	159
第一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与西方早期政治体制起源的影响 ...	159

第二节 门阀士族的形成	164
第三节 宋明理学和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张载哲学	171
 第四章 格物致知与中国古代思想的语言基础	178
第一节 格物致知	178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的语言基础	185
 第五章 张载思想在宇宙论与本体论两条道路上的徘徊	196
第一节 张载哲学的宇宙论和本体论	196
第二节 张载思想在宇宙论与本体论两条道路上的徘徊	213
第三节 张载哲学重要概念解析	227
第四节 张载哲学的核心 ——“太虚”与“气”的关系的思想	240
 第六章 太虚与心	279
第一节 心(太虚)与糟粕	279
第二节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289
第三节 心的澄明与认知	310
第四节 心性结构新思维方式的萌芽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52

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象思维与 体用论、理一分殊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先秦中国文化中包含的法象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在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在其特有的生存境遇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求知型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中国早期的文史典籍里已有反映。思维方式的涉及面非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自然也是由涉及思维的许多方面的特点构成的,但在这里,我们只想研究一种与中国哲学有关并影响中国哲学未来走向的思维方式系列:法象思维方式、体用论和理一分殊。与一般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不同,法象、体用论和理一分殊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哲学思想本身,只不过比起其他的哲学思想,它们更加基础,是其他哲学思想坐落的基质;也正因此,法象、体用论与理一分殊具有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双重的面相。

法象思维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在《尚书》中,涉及纯哲学的表述并不多见,但是有一种思维方式却在好多篇章中都表现了出来,如《尧典》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困，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鸟兽毨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①

这是将日月星辰与四时、四方进行了一种搭配，这种搭配的方式非常有特色，它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中常常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被普遍使用的。由于中国核心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来仔细地研究这种搭配中包含着怎样的内涵。

首先我们会发现，日月星辰、四时和四方形成了三个独立的意义链条，这每一个链条都是一个意义丛或者说意义结构；不过，这样的意义结构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也就是说，每个意义链条或者结构是首尾衔接的，故而是封闭的；在这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的长城，因为长城似乎也是一种把中国围起来的封闭的意义链条，它其实在精神实质上很像我们正在探讨的思维结构。长城将一块空间封闭起来，它不向外开放，在排斥外部空间的同时，它希望在其内部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秩序和结构，一个可被控制的秩序和结构；这不同于西方的城堡，西方的城堡往往会雄踞于一块空间的中心或至高处，用透视的目光看护着自己的领域。

其次我们发现，整个的意义是由单个的意义链复合构成的，从这

① 顾颉刚、刘起鈇：《尚书校释译论·尧典》，中华书局，2005年，第32页。

个意义上来说,每个链条也不是绝对封闭的,它们会把其意义指向相邻的意义链条,上引《尚书·尧典》的话语中便有如下的对应关系:

羲仲、宅嵎夷、日中、星鸟、仲春、鸟兽孳尾。

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仲夏、鸟兽希革。

和仲、宅西、宵中、星虚、仲秋、鸟兽毛毨。

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仲冬、鸟兽氄毛。

这种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尚书》中很多见,兹再举一处经典的出处: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①

这一章的意义构成了如下的意义链对应结构:

水、火、木、金、土。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穡。

咸、苦、酸、辛、甘。

在这种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中,整体的意义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这个整体的意义结构的组成元素不是单个的意义片断,而是一条条互相意指的意义链或意义丛。如果将整体的意义称为意义域,那么可以说,一个意义域是由许多意义丛构成的;而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关系是意义解释和指向的关系。这一点很有意思,中国人的思维不是求知的,求知的思维方式将在一条意义丛中思索和求证,而中国的意义丛却将这种求索的紧张传递到相邻的意义链或意义丛,这种意义链或意义丛互相指向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种法象关系。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也是一种求知,但谙熟中国思想的人知道,这种求知迥异于西学意义上的求知。

法象的观念在《周易》中可以说已经明显地显现了出来,《易传·

① 顾颉刚、刘起鈇:《尚书校释译论·洪范》,第1153页。

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在中国的道文化中，由于道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向人直接地显现，故而观察大道的象和法就十分重要。天地是至大的，象是天显现出的迹，法是地显现出的规则，而象与法的核心意义则是“像”和“效法”；这正如意义链和意义丛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其实在传递道，而意义链或意义丛正是道的法象，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像”和“效法”的关系。《易·系辞》说：“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②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我们立即会想到中国的圣人传统，圣人就是道的显现，而众人则模范圣人而求道；所以中国人很重视模范的示范作用，这是法象思维在人事中的一个重要例证。中国法象思维的这种由意义链条组成的意义域的最精炼的表述是易卦，每个易卦都由六爻组成，在这里，每个卦就是一个意义域，每一爻就是一个意义丛或意义链，而整个的《易经》六十四卦则是一个由较小的意义域构成的超大型的意义空间。在《周易》里，我们看到，每个爻都不是用来求知的，每一爻所言说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都是熟知的，所以这里没有西学意义的求知；如果说有求知的话，那就是中国人对于熟悉的世界的领悟，对于熟悉的人的领悟。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里是非常明确的，儒家的思想，是面对熟人熟事的哲学。世界不是我们求知的对象，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它以熟人熟事的面相与我们交往，它不神秘，它的事是我们所熟知的。孔子说：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③

在孔子看来，万事万物其实都在我们心里，我们所要采取的立场才是最为重要的；虽然我似乎对世界中的事物空空无知，但只要明晓

①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系辞下传》，中华书局，1991年，第257页。

② 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系辞下传》，第256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罕第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

它的两端,我就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决断。对于孔子来说,不是我们不知“仁”是什么,而是我们知而不为,故而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当然,在孔子的思想里,仁也不是孤立的,它也是处于仁义礼智信的意义链条之中的,可以说,仁义礼智信这一意义丛或意义链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这样,中国思想的思维方式的一个核心特征便显现了出来,意义的单元是意义丛或意义链,它们构成高一级的意义域,而高一级的意义域则有可能构成更高级的意义空间。在整个的意义域中,意义丛是对人们熟悉的事和熟悉的人的描述,中国思想往往会把一个意义丛的认知紧张转移向另一个意义丛,似乎通过这样的转移,认知的冲动被遗忘了;因为新的意义丛依旧是对熟人熟事的描述,如有需要,它会继续指向下一个意义丛。我们看到了意义向蛇一样延伸向波光粼粼的意义水面,它没有潜下水底,只是在水面上做色彩斑斓的衍射。然而,对于生存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的中国人,这已经足够了;所以从本源上说,中国思想并没有兴起过大规模的认知自然的运动,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法象意义上的思维。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最原始的基质,在思维方式中就已经沉积出了这个民族哲学未来走向的路基,可以说,中国的意义丛或意义链法象思维方式为中国思想对道的追索的偏好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支持。在《论语》、《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意义丛的出现比较零散,但是对道的追索开始突现;可以说意义丛的思维方式和道是一物的两面,意义丛思维方式是道的深层结构,而道则是意义丛思维方式的显示。在不同的典籍中,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可能会在意义丛思维方式和道两方面有所偏重,但两种表述是互为表里的。孔子和老子是儒家和道家这两个对中国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派别的实际奠基者,在他们的思想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意义丛或意义链的零散表述,也可以看到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表述,比如在《论语》中的以下表述: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述而第七》,第100页。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①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②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③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④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⑤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⑥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⑦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⑧

在《道德经》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表述，如：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⑩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⑪

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⑫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第一》，第51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公冶长第五》，第79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述而第七》，第94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罕第九》，第116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颜渊第十二》，第136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季氏第十六》，第173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阳货第十七》，第177页。

⑧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第二》，第59页。

⑨ 朱谦之：《老子校释》八章，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

⑩ 朱谦之：《老子校释》十二章，第45页。

⑪ 朱谦之：《老子校释》十四章，第52页。

⑫ 朱谦之：《老子校释》二十五章，第102—103页。